

【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豪杰到圣贤：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刘培 赵骥

摘要：在宋代文治政策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前代诗歌中“英雄”“丈夫”这类偏重豪壮雄杰的粗线条人格类型，转变为宋诗中博雅深邃、坚守道德的圣贤君子形象，领袖群英的豪杰人物逐渐褪去其本来面目，其人格内涵被置换为沉潜弘毅和清直自守。在宋诗构建的语境中，“丈夫”往往呈现出和“贤者”相近的意义，展示出“丈夫”形象全新的意蕴内涵。宋诗中的理想“丈夫”往往能够领悟圣贤心传，向着体味心灵境界的内在精神世界开拓；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破除欲望诱惑、支撑自我道德人格体认；在道德人格支撑下，对自我人生价值充满自信，呈现出一种舒适从容、清刚潇洒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宋诗；丈夫；理想人格；豪杰；圣贤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3-0151-07

南宋王十朋在送给友人的述怀诗中说：“丈夫未遇聊尔耳，肯向权门思炙手。净扫一室安吾贫，昼阅诗书夜星斗。”^①在他的认知中，“丈夫”具有高洁傲岸的道德品质，在面对仕途权势的诱惑时，为维护道德人格的独立与尊严，退回自我精神世界中专意于读书求知、生命沉潜。这里既是对自我修养的自信与肯定，也是对志同道合者的勉励与期许。其实，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诗歌中这种“丈夫”称谓不仅包含有作者的价值认同，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的理想自我，在肯定勉励与赞美期许等多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丈夫”形象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士人心态及时代文化风尚等信息。与前代相比，宋诗中的“丈夫”形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展示出宋代政治风尚与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文学书写新趋向，呈现出新的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透露出宋代士人新的理想人格与精神风貌。

一、宋代以前“丈夫”形象溯源与演变

《说文解字》释“丈”为：“丈，十尺也。从又持十。”^②释“夫”为：“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

周制以八寸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③可见，“丈夫”一词的原始意义为成年男子。《周易》中的“六二，系小子，失丈夫”^④，《礼记》中的“丈夫，妇人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无变也”^⑤，与“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⑥，都是采用“丈夫”的原始意义。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丈夫”一词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作为成年男子的指称，并无特殊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诸子典籍中出现“大丈夫”时，则具有明显的价值指向或道德意蕴。如《老子》中的“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⑦，《韩非子》中的“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⑧，偏重于智性修养。《孟子》中则重视道德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⑨《孟子》中的“大丈夫”形象将生命价值的评判标准从权势置换为道德人格，对后世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刻。这不仅是其学说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孟子本人所盼望、期许的普遍士人人格，同时也是他对自身道

收稿日期：2021-07-20

作者简介：刘培，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赵骥，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济南 250100）。

德境界的肯定与自信。这种由坚定的道德践履所存养、支撑起的圣贤人格,成为后世儒家士人们身心安顿和生命情怀的最终归依。后世诗歌中的“丈夫”形象建构,在许多情况下融进“大丈夫”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内涵,成为诗人表达理想自我的渠道。

“丈夫”一词最早进入诗歌是在汉乐府《陇西行》中:“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⑩但是,这里的“丈夫”仅指示性别差异,并无人格品质的内在指向性。诗中“丈夫”最早带上人格意蕴是在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正处在汉帝国崩溃瓦解之后,战乱灾疫使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士人们目睹生命迅速消亡的残酷,因而展现出对现实生命的格外重视,他们普遍追求延长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⑪“生命的密度”包含追求建立功业与人生享受。在此背景下,士人在诗歌创作中展现的自我形象呈现为功业气概与感官享受两个维度。功业气概方面,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⑫吴质《思慕诗》:“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俯仰,庶几烈丈夫。”^⑬这一时期诗歌亦多“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⑭的内容,虽未在诗歌书写中直接将“丈夫”形象和物质、感官享受联结起来,但曹植《与吴季重书》从散文角度以极致的物质、感官享受呈现士人心中“丈夫”的另一维度:“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箏。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⑮

东晋南北朝诗歌中“丈夫”形象基本承袭三国时期的意义范畴,如陶渊明申明“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⑯,鲍照也感叹“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⑰,或自勉或抒愤,都指向对功业的追求。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且此期的南北战争多了一层华夷之辨的色彩,所以诗歌中的“丈夫”形象较多和边塞战功联结起来。“当今丈夫志,独为上古英。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⑱、“君言丈夫无意气,试问燕山那得碑”^⑲、“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闻天。但令此身与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⑳,这些诗句体现着作者渴望在边塞战争中立功扬名的热情。

唐代诗歌中“丈夫”形象内涵依然主要集中于功业与享乐两个方面。但唐代士人在诗歌中表达建立功业愿望时,有一点异于前代,且颇为有趣。作者

常以困守书斋、皓首穷经的书生儒士作为反面教材,以衬托“丈夫”建功立业是如何英明正确。如岑参《银山碛西馆》中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㉑高适在羡慕“丈夫拔东蕃,声冠霍嫫姚”^㉒的同时,也嘲笑文人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㉓诗人梦想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育穷书生们该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权德舆在《建除诗》中也有相似的感叹:“建节出王都,雄雄大丈夫。除书加右职,骑吏拥前驱。开济今如此,英威古不殊。闭关草玄者,无乃误为儒。”^㉔皮日休在其《七爱诗》中说:“所谓大丈夫,动合惊乾坤……百世必一乱,千年方一人。吾虽翰墨子,气概敢不群。”^㉕从这些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他们本都是文人,但在诗中却一致表达着对诗书生活的厌弃,追求功业、地位构成他们笔下“丈夫”的基本意义内涵。此外,自中唐起,宦官和党争影响下的国家政治日益昏乱,现实黑暗与人生苦闷令士人们难以看到出路,诗歌中的“丈夫”形象也呈现出追求享受的一面,李贺诗中就以以此来消解心中的郁结:“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臞蠃臞熊何足云,会须钟饮北海,箕踞南山。”^㉖李贺诗中的“丈夫”沉浸在了酣宴声乐之中,而皇甫冉笔下的“丈夫”更露骨地追逐感官享受:“生当为大丈夫……骑龙披青云,汎览游八区……群仙来迎塞天衢,凤皇鸾鸟灿金舆。音声嘈嘈满太虚,旨饮食兮照庖厨……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姝。”^㉗诗人借出世游仙所经历的种种享乐情景,表达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上延展生命、满足个人欲望等人生企望。

二、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新变

宋代自立国起就伴随着文治复兴的展开,宋太祖与赵普“道理最大”的对话即昭示了文治与理性在宋代政治与社会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宋太宗时,科举录取人数大幅增加,极大地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转换。国家政治方略的转变、文治复兴的时代趋向等因素促使宋代士人们更多地转向自身,他们不再艳羨武人们的军功,而是更加重视自身的文化素养,于是宋诗中的“丈夫”形象相较于前代呈现出新的意义特征。这种新变迹象首先在石介的《过魏东郊》诗中显现出来:

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十三断贼指,闻者皆惊怖。十七著野史,才俊凌迂固。二十补

亡书,辞深续尧禹。六经皆自晓,不看注与疏。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韩愈……死来三十载,荒草盖坟墓。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试过魏东郊,寒鸦啼老树。丈夫肝胆丧,真儒魂魄去。^⑳

该诗是石介为凭吊柳开而作。历史上的柳开人生经历兼具文与武两个方面,他在力振儒学的同时,也有勇武豪侠的犷悍气质。在该诗对柳开的叙述中,从儒道斯文和勇武韬略两个层面建构一个完整的“丈夫”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对于“丈夫”的认同,在战场军功之外,将目光重新聚焦于学术涵养和文化才能。当然,石介笔下的“丈夫”形象在相当程度上仍带有勇武雄强等粗线条人格类型,而其“斯文”一面也只限于对柳开经史、文章等才能的客观描绘,尚未深入到士人精神气质以及内向开拓等深层内容。对于这些深层内容的表现,则是随着文治政策的深入以及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向内在而逐渐出现的。

北宋逐渐形成稳固且运转有序的文治模式,在儒学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代士人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研求学术和读书明理上。士人们不仅早已习惯通过读书和科场来博取功名,而且更为重视读书写作带来的精神愉悦。欧阳修就把虽困顿官场,但腹有诗书、才华横溢的陆子履作为“丈夫”的典型:“丈夫可怜憔悴时,世俗庸庸皆见遗。子履自少声名驰,落笔文章天下知。开怀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阱机。鬓毛零落风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诗。”^㉑诗歌中的“丈夫”越来越注重读书明理和文化才能。

如果说在转变初期,宋诗中的“丈夫”形象还是兼具勇悍和读书两个层面,仍保有前代诗歌“丈夫”形象的影响痕迹,那么到了王令诗《道士王元之以诗为赠多见哀勉因以古诗为答》中塑造出的“丈夫”形象,则通过对“勇黠”“使气”的否定,把读圣贤书、明六经理作为唯一人生理想,实现了由英雄豪杰向圣贤君子的转变:

吾非小丈夫,胸中少翹奇。少年嗜勇黠,跨压百雄低。两眼皆豚羊,一腹千熊黑。使气睨群辈,问今当我谁……一日忽自悟,吾岂虔强儿。旧闻有六经,条理两可师。无不至圣人,有学中自隳。勿遂谓不及,吾由未尝追。好勇不好道,吾将自诛非。浩乎如有失,茫乎其若思。望乎如未获,专乎如有期。夜或不记寝,昼或忘

其饥……上自太古先,跂轩而望羲。下至三代来,尧舜禹汤姬。周公汲汲劳,仲尼皇皇疲。轲况比踵游,雄愈磨肩驰。或示我使响,或导我使随。^㉒

诗中以自我心路的动态转变过程展现出作者所认为的真正丈夫形象。在王令的笔下,“丈夫”形象经历了从好勇使气到潜心儒经这样一个动态转变历程,他醉心于圣人学问的广大高深,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在追寻至道中感受到绵绵不尽的快慰满足。这种对读书明理、内向开拓的强烈追求也在苏轼笔下有着生动简要的概括:“羨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丈夫贵出处,不退要当前。”^㉓闭门读书是令人歆羡的生活之乐,宋代士人更想回归读书人这个本来身份,在这个人生底色的映照下,融通于广阔而深微的精神世界之中,形成沉潜内转的精神气质。

宋室南渡以后,尤其是到了孝宗时期,理学在南宋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日趋深广,理学观念也在深度参与塑造文学创作的风貌。士人们尤其是理学中人认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探求天地至理,在于对儒家真意、圣贤心传的默然感悟与独到领会。即使面对物质上的困顿窘迫,他们也仍然要坚守精神独立、潜心探究并继承往圣绝学,唯有如此,才可成为与天地同体的大人君子。在南宋理学中人的诗歌里,“丈夫”形象也表现出感悟先圣心传、建构学术体系等特征。如叶适在其诗作《魏华甫鹤山书院》中以大段的笔墨描述魏了翁承续儒学道统、探求圣贤真意的诸多功绩,着重表现其孜孜以求地沉思体悟圣贤精神、于千载之下感通圣人之心的学术活动:

周公仲尼在左右,勘点六籍开凡愚。曾经秦祸多散阙,郑笺毛传悲纷如。精神感通若亲授,损益殷夏还其初……业调甘酸嗜秦炙,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愤发贯篇首,端的镂写传吾徒……莫嗔猿鹤不解事,与民由之诚丈夫。^㉔

澄清学术正统、勤于著书立说,这些活动正是理学家们普遍的生活场景。叶适如此细腻描摹和热情赞美魏了翁,其实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理学家群体的称赞颂扬。诗中最后说“莫嗔猿鹤不解事,与民由之诚丈夫”,在赞美魏了翁学术开拓之功以后,认为也应该携精纯深微之学术与民众共同行仁义之道。王柏《用前韵答车玉峰》则完全着眼于学术探究,讲求学术是作者本人最为重视的人生意义所在:“人物如君屹鼎湖,高山仰止我仪图。讲篇损益开

新式,略纪删修有定模。目断交情殊恨阔,心涵古道若相符。去年不客东湖上,几失人间大丈夫。”^③

由外在的事功、富贵转向内在的沉潜、博大,将读书明理作为生命乐趣之所在,宋诗中“丈夫”内涵的这种新变,是宋代国家政治方略变迁与社会文化心理重塑在诗歌创作上的投射。宋代士人在国家文治政策下可以凭借文化才能跻身高位,而且宋代处于“各派主流思想如儒、道、释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已趋于单纯与内敛”^④的历史阶段,前代诗歌中“丈夫”们向边疆塞外、战场军阵和酣宴享乐中倾泻挥洒的热情与精力,到了宋诗中则聚敛收缩进书斋典籍中,并且在这个看似狭小的平淡空间中,开拓出广阔的精神世界,得到钻之弥深的无限乐趣。

三、学为圣贤:宋代“丈夫”的理想人格

五代士风苟且卑下,北宋建立后的要务之一便是矫正士风。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亲自审定文武七条准则赐予官员,其中提及:“二曰奉公,谓公直廉洁,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⑤,以君主诏令的形式要求官员们必须修身立德。仁宗时期,君臣们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变士风,并以此基点来逐步建立尊崇礼义、风俗淳厚的太平社会,崇尚道德的新士风得到广泛树立和倡行。范仲淹是革新士风的核心人物,陈傅良《温州淹补学田记》中评价说:“自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⑥在范仲淹这些士人的心理认知中,道德不再只是朝廷对官员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内化为精神气质和人生准则。范仲淹晚年“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⑦?对于道德的坚守绝非无乐趣的约束,而是可以超越有限生命之束缚的永恒价值。在道德践履的心灵慰藉中,可以让自我感知到悠长深远的生命乐趣。道德涵养始终是宋代士人重视的话题,道义内充可以让他们获得超越性的精神力量,站在道德践履的角度上来看待富贵穷通的命运对比。比如颜回早死和盗跖寿终的命运对比,常令士人们感叹天道难知,宋代士人则以道德之乐的超越与永恒,来消解这种对命运的无奈和怀疑,欧阳修曾作《颜跖》阐明立场:

颜回饮瓢水,陋巷卧曲肱。盗跖餐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寿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祸福岂足凭!跖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万世尚遭戮,笔诛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饱臭腥。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惟其生之乐,岂减跖所荣。死也至今在,光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与英。生死得失间,较量谁重轻。^⑧

诗中道德践履作为生命永恒的价值,千载之下,颜回的道德修养与不朽联结在一起,道德不仅是颜回人生之乐的集中展现,也是抵抗时间对生命之消磨的唯一手段。

庆历士人群体之后,崇尚道德之风仍为宋代士人重视和继承,苏轼在写给李廌的信中将道德修养作为人生之首要任务,反复强调道德远比功业富贵重要:“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⑨仁宗嘉祐前后开始活跃的理学中人则更将道德放置于本体地位,如“二程”在道德体认的基础上建构“天理”,并以此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根源,认为个体生命的道德践履可以沟通人与道德本体,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追求精微超凡的“内圣”。牟宗三对此曾论述说:“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生命之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⑩道德并非限制,而是自由,在具体道德行为向道德本体的跃升中,人生的意义得以凸显,并获得永恒的安宁愉悦,个人则成为人格完善的圣贤君子。

邵雍在洛阳居住期间与西京士人群体之间的来往颇为密切,此期他的诗作中不断地展现拥有道德情怀的“丈夫”形象:

冠盖纷纷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⑪

大舜与人同好恶,以人从欲得安乎。能知富贵寻常事,富贵能骄非丈夫。^⑫

一片先天号太虚,当其无事见真腴。胸中美物肯自炫,天下英才敢厚诬。理顺是言皆可放,义安何地不能居。直从宇泰收功后,始信人间有丈夫。^⑬

洛城官满振衣裾,尘土何由浼远途。道在幸逢清日月,眼明应见旧江湖。知行知止唯贤

者,能屈能伸是丈夫。归去何妨趁残水,三吴还似向时无。^④

这些诗中的“丈夫”形象,轻视外在的富贵和享受,将儒家的道德原则内化为心灵本体,并且在具体的道德情怀中体会道义对于人格尊严的内在支撑,获得心灵安顿的自在从容。邵雍的这些诗作展现出,在宋代思想文化塑造下,尤其是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士人人生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人生至乐绝非立功扬名和富贵尊荣,这些外在之物只是低级的人生追求,唯有遵从儒家道德原则才能真正拥有适意人生和独立人格。

士人在道德坚守的同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诱惑,谋求仕途升迁与坚守道德人格之间的矛盾选择常常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古代士人的一大人生理想就是通过进入仕途、参与朝廷政治来辅世济民。官职擢升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实现政治抱负或振兴家族,但同时也意味着要面对各个方面的利益纠缠与人际逢迎,这样就在道德人格与仕途前景的矛盾纠结中,拷问着每个士人的心灵追求与品质坚守。

南宋的朝堂党争比之北宋中后期更加尖锐激烈,士人们围绕南北和战、道学崇黜等问题展开争斗。在这些党争之中,有通过攀附权贵、迎合上意而得以升迁者,也有刚正独立、坚守原则而被贬者。李纲、赵鼎因主站而被罢黜,朱熹等理学家群体在孝宗和光宗时期被启用或被禁锢,即是南宋政局下士人命运波折的集中展现。这些处于矛盾选择和命运波折中的宋代士人们,常以道德为人生准则,重视道德坚守的超越性价值,王十朋和杨万里笔下的“丈夫”就呈现出以学为圣贤来自我期许、爱惜声名的形象:

黄卷对圣贤,慷慨深自许。一朝出干禄,得失战胸宇。曲意阿有司,谤言徇人主。贪荣无百年,贻谤有千古。丈夫宜自贵,清议重刀斧。^⑤

老夫今年六十四,大儿壮岁初筮仕。先人门户冷如冰,岂不愿汝取高位。高位莫爱渠,爱了高位失丈夫。老夫老则老,官职不要讨。白头官里捉出来,生愁无面见草莱。老夫不足学,圣贤有前作。^⑥

“圣贤”始终是树立在“丈夫”面前的人格典范,而学为圣贤就是要以道德坚守来对抗荣华的诱惑。王十朋这首诗是为自己而发的内心独语,在他看来,

道德瑕疵所招致的后世指责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最大否定。杨万里这首诗是为即将入仕的儿子所作,他期待儿子仿效古代圣贤的道德人格,不可为官职晋升而放弃人格坚守。在这些更具个人化倾向的文学书写中,他们都将道德坚守置于生命意义的首位。通过坚守道德而学为圣贤,在道德践履中得到心灵安顿的自由和舒适,进而在历史中留下令名以对抗时间的消磨与埋没,宋代诗歌中“丈夫”呈现出忠厚正直的品格,以及谨守儒家道义原则的行为选择。

四、从容清刚:宋代“丈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伊始确立起文治策略,其后经过数十年的完善发展,在真宗、仁宗时基本形成成熟的士大夫政治体制。在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士人秉承孟子“修天爵以胜人爵”的思想,多具备挟道德学术而自重的思想倾向。周敦颐《通书》中认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⑦。王安石则希望借助道德人格来规范皇权,“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向焉,而与之迭为宾主”^⑧,认为即使皇帝也必须给“道隆而德骏者”以充分的平等和尊重^⑨。在皇权统治下,士人们凭依道德人格与学术修养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此外,宋代士大夫的待遇相当优厚,士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学术、文化方面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经济地位,因而也就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去追逐物质财富,而是更多地在相对裕足的生活中追求内心宁静和道德名节。向内开拓的宁静自守、道德坚守的独立尊严映照进诗歌创作,展现为“丈夫”形象中从容不迫、清刚潇洒的精神风貌。

由内心的宁静和独立出发,宋代士人常常为朴素寻常的事物赋予高洁傲岸、逍遥自适等象征意义。在他们看来,这种朴素寻常正代表着独立于世俗庸常之外的高贵人格,其中所透露出的修养之乐远远胜于物质享受和声名。司马光在《闲中有富贵》中说:“闲中有富贵,迥与俗尘殊。水净齐纨展,花繁蜀锦纡。竹风寒扣玉,荷雨急跳珠。可笑公孙衍,酣歌誇丈夫。”^⑩诗作末二句化用《孟子》中关于“大丈夫”的论述,公孙衍代表的“丈夫”内涵是执掌天下权柄,威势过人,这是世俗眼中的“大丈夫”,也是前代诗歌中反复表现的“丈夫”形象。司马光承袭孟子的思想,否定公孙衍式的“大丈夫”,他所赞赏的

形象完全脱离权势与财富,而以流水繁花、竹风荷雨代替以往的枭雄意气,将其置换为高雅出尘的君子品格。在由枭雄向君子的意义转换中,司马光从新的认知角度赋予“丈夫”形象以定心凝志、从容雅致的精神与风姿。

这种从容的精神风貌在士人们面对困境时往往表现得更加鲜明,且常因窘迫环境的映衬而展现出清刚洒脱的人格特征。内在的道德信念支撑宋代士人们在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时,能够抵抗种种物质欲望的诱惑,以磊落的胸襟意气和不为困顿生活所屈服的清直耿介来面对挫折和超越困境,保持清白独立的人格,呈现出傲岸不屈的精神力量。南宋之初,李纲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朝廷,他在海南贬所写给友人的诗作中说:“饱经忧患莫如吾,暮景余生寄一椽。独子相从来瘴海,岂知还得共归途。应观天下奇男子,解笑人间浅丈夫。老去山林养衰疾,好音时与系飞凫。”^① 忧患人生、坎坷宦途,在“笑浅丈夫”与“观奇男子”的简淡对比中反而呈现出阅尽沧桑后的超脱和潇洒。如果说李纲诗中还对忧患背景作出模糊与概括的处理,那么张九成诗《食苦笋》中则将窘迫境遇描绘得更为详尽,并在这些忧患中呈现出人格的清刚与尊严:

吾乡苦笋佳,出处惟石屋。玉肌腻新酥,黄衣缘深绿……搗来庾岭下,岁月去何速。经冬又七春,未分穷途哭。今朝好事者,惠我生一束。头髻甲斓斑,味恶韵粗俗。儿童不惯尝,哆噫惊媪仆。老妻念乡味,放箸泪盈目。丈夫志有在,何事校口腹。呼奴更倾酒,一笑风生谷。^②

这首诗是张九成滴居南安军时所作,在对贬谪生活的艰苦、家人生活的辛酸进行详细描绘之后,作者以“丈夫固有志,一笑风生谷”来消解并超越贬谪离京、食物匮乏的人生困顿。他并非对生活的艰难毫无感知,诗中描绘出的故乡饮食风俗既是追忆美好,也是感怀今昔,在故土与贬所、当下与过往的交织对比中,“丈夫”形象中坚定的志向与操守串联起不同生命阶段的各种际遇,从而具有了清刚洒脱的精神风貌,呈现为道德与审美的双重意蕴。

在被贬谪或是不得志的穷愁困窘之中,人的日常基本欲求常常难以得到满足,士人们只能用精神解脱的方法来暂时压倒这种基本的欲求,以期获得心灵适意、思想慰藉。但是,这种基本的生理欲求又

不是容易被消解和超越的,因而士人们必须以他们最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念来对抗基本生理欲求缺口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和心理压抑。所以,这种情境下的诗歌创作所展现出的信念、追求,也往往显示着士人们内心深处的学养根基和人生底色。颜渊居陋巷饭疏食饮水的圣贤垂训、陶渊明的高洁不染等历史典范,便在此时被频繁地回忆并援引作为士人自己超越困顿生活的精神支撑,成为他们诗中赞美的“丈夫”人格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那种坚毅品质和高洁人格被他们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背景下反复诠释,为宋代士人诗作中的“丈夫”形象注入内在的人格力量和尊严。如王质《送张监税归去来歌》中所展现的抱直守道之友人的品格与意气:“君不见义熙元年陶彭泽,偶缠秃绶称长官,俄颺轻舟作归客……公田虽收半顷税,不似东皋种禾满阡陌。后园之柳为我贮清阴,东篱之菊为我发佳色。浊醪妙理汝不知,素琴真趣吾能识。陶隐君,张公子。千二百年同一轨,丈夫意气当如此。”^③ 丈夫意气不再是豪侠奇士的感慨激越,也不是富贵已极的威仪奢侈,而是转变为剥落繁华喧嚣的朴素自然,代表着返归天真本性的真率潇洒,呈现出清直守素的独立人格。南宋晚期的何基在《宽儿辈》诗中说:“丈夫何事怕饥穷,况复箪瓢亦未空。万卷诗书真活计,一山梅竹自清风。”^④ 诗中的“丈夫”对物质的困穷毫不挂怀,而是在诗书、梅竹所代表的平和清雅中寻味人生乐趣。在何基看来,这些平凡的、带有深厚文化气韵的景象才是士人理想人格的映衬与写照。“丈夫”的意义内涵呈现为箪食瓢饮、抱道而居的潇洒从容。

词汇所承载的内涵通常是稳固、确定的历史记忆,其意义范畴凝结着人们心中不易改变的价值指向,而其一旦发生改变,则必然代表着社会文化心理的整体转向,并进而带来文学表达上的种种变化。宋诗中“丈夫”形象的意义转变,其根源在于宋代统治政策以及整体思想文化的转型,政治上的崇尚文治、思想文化的转向内在、士人心态的沉潜内敛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了诗歌表达中新的“丈夫”形象。宋诗中的“丈夫”纵意沉潜,趋于平淡深沉,在学与思的日常活动中获得广大深邃的精神空间;同时,他们也展现出学为圣贤的道德情怀,在内在沉潜和道德情怀造就下呈现出雅致从容、清刚傲岸的人格美。这种新变遥接孟子“大丈夫”人格内涵,又呈现出宋型文化新的时代特征,成为审视宋代士人心态和思

想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绝佳剖面。

注释

①④⑤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册,1998年,第22630—22631、22585页。②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89、504页。④③〔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91、250页。⑤⑥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339、887页。⑦〔三国〕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93页。⑧〔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页。⑨〔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266页。⑩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中华书局,2008年,第36页。⑪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⑫⑬〔三国〕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45、210页。⑭⑮〔宋〕晁补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412、2100页。⑯〔南朝〕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⑰〔晋〕陶渊明撰,王叔岷笺证:《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6年,第411页。⑱〔南朝〕鲍照著,丁福林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673页。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916页。⑳〔北朝〕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411页。㉑〔唐〕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386页。㉒⑳〔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93、269页。㉓〔唐〕权德舆撰,蒋寅笺:《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辽海出版社,2013年,第762页。㉔〔唐〕皮日休著,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㉕〔唐〕李贺著,吴启明笺注:《李长吉诗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01页。㉖〔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4151页。㉗〔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㉘⑳〔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10、3页。㉙〔宋〕王令著,沈文倬校点:《王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㉚〔宋〕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882年,第215页。㉛〔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77页。㉜〔宋〕王柏:《鲁斋集》卷三,“影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㉝傅乐成:《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社,1977年,第384页。㉞〔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4009页。㉟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68册,第244页。㊱〔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第1271页。㊲〔宋〕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0页。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页。㊴⑳⑳⑳⑳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336、445、447、278页。㊵〔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9页。㊶〔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3页。㊷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65册,第37页。㊸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描绘道:“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谓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诗中的豪雄和扬子是作为对比映衬而存在的,代表着权势、巨富和学识、清贫两种不同类型。但到了程颢诗中,“豪雄”由卢诗中的强横权臣,变为和乐从容、坚守道义的儒者:“睡觉东窗日已红,闲来无事不从容。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从某种程度上说,程诗中的男儿楷模即是卢诗中“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扬子,儒者风姿不再是舞台上寂寞的零余者,而是判定士人人生价值的最终标准,这种转变也是“丈夫”内涵在宋代新变的参照和注解。到了家铉翁《圯上行》中,“丈夫”更是被作为儒者伟岸形象下的附属品:“扫除申商斥佞符,混合宇宙需吾儒。便应平跻古王佐,小却亦称大丈夫。”对儒家道统的推重和对儒家原则的认同,支撑士人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在这种心态和价值认知之下,挟道自重的人生态度在诗歌中展现得极为鲜明。㊹〔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第415页。㊺〔宋〕李纲:《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第330页。㊻〔宋〕张九成著,杨新勋整理:《张九成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页。㊼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册,1998年,第28819页。㊽〔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责任编辑:采薇

From Hero to Sage : The New Changes in the Meaning of the Image of Man in Song Poetry

Liu Pei Zhao Ji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bold personality types such as "hero" and "man" in the poetry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who were biased towards heroic hero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e of sage and gentleman with profound elegance and morality in the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heroes of the leaders gradually faded their original fac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ir personality had been replaced by deep potential, resolute and upright self-defense. In the context of Song poetry construction, "man" often presented the meaning similar to that of "sage", showing the brand-new connotation of the image of "man". They understood the inner spiritual world of sages and appreciated the spiritual real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fucianism, "man" should get rid of the temptation of desire and support his own moral identity; Under the support of moral personality, they had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life value, displaying a kind of comfortable, calm, clear and unrestrained spirit.

Key words: Song poetry; the image of man; hero; sage; ideal personalit